

## 小人物的“传奇”

自从汪曾祺那句“《棋王》写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sup>1</sup>，对《棋王》里关于“棋”与“吃”的探讨就成为对这部作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三十几年来形形色色关于“棋”与“吃”的探讨，基本的观点也是基于对《棋王》整体风格、主题的把握，大体上分为“现实主义文学框架下的另类知青文学”的归类以及“寻根文学”的归类。前者认为，《棋王》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对“知青”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群体的生活的写实性描述，但是又是对传统意义上知青文学的一种超越——不是选择传统知青文学对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意义寻求的某种意义上的“自恋式”的视角，而是用王一生的视角展现知青生活需要关注生计的凡俗性，以“消解前者主要试图为知青史赋予的英雄化或苦难化的历史想象”<sup>2</sup>；而后者则更多受到80年代中后期“寻根”思潮的影响，倾向于从抽象的层面抽离作品本身的写实性描述，赋予《棋王》中王一生的生活与棋道以儒、道精神，或者以更为宏大的“民族性格”等方式来“广化”王一生的性格，以发掘背后的文化传统。因而从这两种批评思路出发，“棋”与“吃”这两组关键词也有了不同的阐释含义。然而在新的时代，“棋”与“吃”也可以有新的理解和思路。

### 一、现实主义视角下“棋”与“吃”的“去精神化”

“唯物论”视角强调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物质性，产生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在经历长久的对于物质层面“苦行僧”式的倡导和对精神层面的以“革命精神”代替一切文化的禁锢之后，改革开放开始给予人们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追求多样化的可能性，尤其给予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美好的正当性。同时，在革命热情过度高涨的六七十年代，一种“去精神化”的思路也渗透在生活与创作中。“强调物质生活、强调饮食居家过日子，也是那个时期刚刚滋生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sup>3</sup>。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阐发《棋王》中王一生的“棋”与“吃”，实际上都是只是简单满足生活需要的活动之一，是一种“凡俗”的行为，而并无多少文化意义的内涵。

关于“吃”，在唯物论的视角下进行阐释，其实意味的是传统底层民众的对于生活本身的朴素愿望，就是传统说法上的“民以食为天”，这里的物质性显得露骨地真实。而对于“有饭吃”这一朴素愿望的执着更是刻在了《棋王》对于王一生描写的方方面面：他在火车上吃饭时那副认真、虔诚、精细而又带点穷酸样的吃相

<sup>1</sup>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载《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sup>2</sup> 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第47页。

<sup>3</sup>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32页。

精彩绝伦的描写,母亲生前对他的教导,尤其是他话语中无时不刻表露出的对“吃”的看重……反映的其实是在底层人民心中简单的对于生存艰难、“吃饱即是福”的观念。这一观念尤其反映在王一生的言语表态中:

“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旦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sup>4</sup>

“我主要是对吃的要求比较实在。”<sup>5</sup>

“……他呆了许久,凝视着饭盒里的水,轻轻吸了一口,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这个人是对的。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地下。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写书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呢?……’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sup>6</sup>

这两段所展现王一生对于“吃”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了:他将“吃”视为最基本的、最不能断的、高于“棋”的东西。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子弟,“吃”在这里的意味,就是最为朴实的普通老百姓对于生存的向往。

那么“棋”又意味着什么呢?棋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被赋予强烈文化含义的行为似乎难以与其文化内涵剥离。但是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下,“下棋”更倾向于被看作是王一生的一种逃避和自我隔绝<sup>7</sup>。在知青生活中的竞争,“寻找一切机会推荐上大学、招工、招干”<sup>8</sup>的背景下(例如文中脚卵的行为),王一生作为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并没有多少能力能够与其竞争,因而他的无奈、无助甚至不满和自卑寄托在了“下棋”这个行为中——

“对,说什么吃的事情,还是下棋。下棋最好,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sup>9</sup>

因而在王一生的这句话中,“棋”与“吃”的关系呼之欲出。“吃”象征着对人类最基本生存欲求的表达,而在一个甚至连“吃饱饭”都无法满足的年代的主人公身上,“棋”就成了他解忧的行为和途径。“吃”与“棋”在这里并没有物质意义和精神追求上的两者的二元对立,而是形成了生活的最基本的、相互补充的需求,是一种俗世化的生活的反映。就像文章本身中所说的一样,“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sup>10</sup>

<sup>4</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sup>5</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sup>6</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sup>7</sup>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30页。

<sup>8</sup>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31页。

<sup>9</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sup>10</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 二、寻根文学思潮下的“棋”与“吃”

寻根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流入,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样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学习模仿为代表的“现代派”和研究传统文化、立足本位文化的寻根文学思潮。它强调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文学上和美学上的意义挖掘。因而在寻根思潮阐释视角下的《棋王》,既有道家学派的“无为”,又有儒家的君子当自强不息;是对于传统中华棋道的弘扬,甚至被阐发成为了某种意义上“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这样的理解下,“吃”就不应该是单纯意义上的吃,王一生那种对“吃”仅仅是一份求“饱”而不“馋”的淡泊态度也在某种意义上被阐发成为道家哲学平和、洒脱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那么“棋”呢?“棋”在寻根文化的阐释下则有了更多的内涵。例如通篇对于以象棋为主要的描述对象即为在表层意义上认为这象征着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承载;在王一生以及老者的“棋道”即为对道家“以柔克刚”、“无为即无所不为”等传统思想的继承;王一生本人作为贫苦出身的平民子弟却能在“棋道”上精益求精,更显示了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的传承;甚至最后的“一人对九人”的最后对决,也被能够被阐释为墨家“游侠”精神的象征<sup>11</sup>……这些象征最终凝练成为一种关于“民族性格”的概念:一种在淡泊的无所作为中继续内在的生命力量,而却在投射出来的时候显示出强大的民族的智慧、生机和意志。<sup>12</sup>

在这样的意义下,“棋”与“吃”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融为一体的,它们都脱离了其具体化的“吃饭”、“下棋”的意涵,更多地被赋予了整个充满传统文化性格的主人公的生活态度的体现。“棋”与“吃”,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 三、小人物的“传奇”——基于新时代的新阐释下的“棋”与“吃”

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素有历史现实指向与回归文本本身的两种不同方向之争。或是认为文本的历史意义具有优先性而应该被带入阐释,或是认为文本应该是作为感性的、美学的语言所存在。实际上二者均有其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但二者实际上载实际操作上是难以分离的——对于文本的阐释,阐释人本身的思维也难以脱离时代本身的影响,但即使是对于时代意义的阐发,也离不开文本本身的情节、人物所限制。寻根思潮对于《棋王》寻根意味的赋予难以摆脱其时代性,现实主义视角同样无法摆脱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在当今的时代,基于新时期的生活经验,又如何理解和阐释“棋”与“吃”这一对概念?又如何理解二者背

<sup>11</sup> 李蕾:《浅谈〈棋王〉中的游侠精神》,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1-73页。

<sup>12</sup>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29页。

后的关联?

阿城在关于《棋王》最早的创作自述出自致仲呈祥的一封信中:

“《棋王》里有我的哲学,即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底下的贫民阶层知青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作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这种历史观与社会观未知成立否?还望指点。”<sup>13</sup>

这里阿城提到了一个甚少被提及的点——“普通人的‘英雄行为’”。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在当今时代可以值得被更深入挖掘的一个意义。“时代”这个概念对于人来说的“宏大”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的,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言,人在日益壮大的资本面前显得越来越渺小。资本闯入人的生活中,在人的工作中、生活中乃至思想中仿佛具有统领一切的能力。当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尺标开始夷平一切所谓“意义”的同时,人们在资本所构建的无孔不入的帝国中日益为衣食忙碌,日子好像早已被刻画好了一般一日一日平淡而庸碌,人也愈发丧失了创造某些“意义”的能力。

诚然,生活本身确实也是值得品味和寻求“幸”与“福”的,而被“资本”所支配的大半部分人生,本身也就是无法抗拒的这一时代下人的命运。《棋王》本身所蕴含的,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对于生活本身的接受和欣赏这一态度。但是结尾中还有一句——“可囿在其中,终于还是不太像人。”<sup>14</sup>又微微透露出了对于仅限于俗世衣食生活的不满——是“不太像人”了。人大概生活着,不仅需要接受自己作为“小人物”的淡然的心态,还是需要追求一些“意义”和“价值”,才能从衣食和灵魂上都将自己安放在时代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位置。

而这一理解在“吃”与“棋”中能够得到更具体的阐释和体现。“吃”代表什么——“吃”是这个世上所有人只要活着,就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说“吃饱”是70年代对于中国人的一个普遍性的时代要求的话,那么换到今天,“吃”所意味着的应该就是在当今中国时代下时代给予人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得更好?更具体一些,放到类似“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可能就是诸如“如何找到一份能够供养自己与家人的工作”、“如何买到一套房子”这样的面对所有人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回到文本,还是以主人公王一生为例——王一生对待“吃”的态度,是将其作

<sup>13</sup> 参见仲呈祥:《阿城之谜》,载《现代作家》1985年第6期;《钟氏父子素描——记钟惦棐与阿城》,载《青年作家》1987年第4期;《阿城印象记略》,载《人物》1989年第3期。转引自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第44页。

<sup>14</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为生命的根本，而又对其具有实在而不过分的追求。换言之，他求“吃饱”，而却不“馋”。他接受了在那样一个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贫苦出生的平民子弟，他是很难具有追求其他如同脚卵一般出身的家庭的同龄人们高雅的“吃”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他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在听到脚卵对于其祖上吃燕窝的盛况的描述时内心有着不小的触动，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人生态度：他接受了时代的赋予和定义，并学着在不可抗拒的生命中发掘本身的趣致。

“棋”代表什么——“棋”是每个人不同的个人选择，是个人可以选择给予平淡的生活以不平淡、平凡的生活以不平凡的寄托。如果说《棋王》对于王一生“吃”的定义是粗糙而实在的，那么对于“棋”的描写则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在王一生的身上，“棋”是他所热爱的一项活动，而王一生对于“棋”不仅仅是“玩玩而已”，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棋呆子”——他精益求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的尊严的某种捍卫。在“棋”上，王一生不再是一个平平凡凡、淹没于人海的王一生，而是一个被大家都口口相传的高手。最后一场“大战”的描写颇具传奇色彩，甚至有些武侠小说中最后高手对决的意味。这场艰难的、浩大的胜利，出自一个贫困潦倒的、从小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小人物”的“传奇”。因而“棋”作为王一生除了“吃”以外的生命中最重要事情，所肩负的还有对于赋予平凡生活不平凡“意义”的作用。

“棋”与“吃”结合在一起，在王一生身上体现着的是一种对于时代赋予渺小个人避无可避的命运坦然接受、甚至寻找其中幸味，与在这平凡人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传奇”的人生态度。而根本上而言，进一步抽象，这种态度甚至也具有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壮的美感——对于一个时代这样庞然大物的安排，虽然在其中挣扎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是在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无奈以外坦然接受它，但又不甘于成为被时代安排的木偶，而是非要在这宏大的时代下找到支配自己的“自由”——在“棋”里，“王一生们”能够褪去物质世界中的枷锁，自由地舞蹈。借用我的一位老师的话说，这是个人的“小宇宙”。

最后以那位老者的“棋道”作结：

“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你想变，就不是象棋，输不用说了，连棋边儿都沾不上。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sup>15</sup>

<sup>15</sup>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 参考文献:

- [1] 阿城:《棋王》,载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页。
- [2]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载《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 [3] 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第40-49页。
- [4]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载《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第49-55页。
- [5]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28-142页。
- [6] 王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阿城〈棋王〉研究状况综述》,载《华中人文论丛》,2013年第2期,第39-41页。
- [7] 李蕾:《浅谈〈棋王〉中的游侠精神》,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1-73页。
- [8] 李尚徽:《浅析〈棋王〉的文化寻根》,载《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5期,第186页。
- [9] 马晓雁:《“吃相”遮蔽下的“世相”与“真相”——再读阿城的〈棋王〉》,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05期,第31-34页。
- [10] 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第20-26页。